

Spring 2017



# 亚洲研究动态

## Asia Research Network

March No.36

2017年3月 第三十六期



##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36 期  
2017 年 3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655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 编委会顾问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邱 勇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潘一山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吴朝晖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Regsuren Bat-Erdene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李 越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朴灿奎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azartseren Boldgiv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 CONTENTS

## 目录



### P.02

→ 2017年3月26日下午，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并在阿语楼国会厅发表了题为《尼泊尔—中国关系：发展与繁荣前景》的演讲。



### P.06

→ 2016年12月2日至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6”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行。

## 特稿

- 02 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到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并发表《尼泊尔—中国关系：发展与繁荣前景》的演讲
- 06 “国际儒学论坛·2016”举行

## 学术活动

- 08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印度尼西亚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成立
- 11 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成立
- 13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东南亚研究及学科建设研讨会举行
- 15 《俄罗斯前汉学时期的中国形象》学术讲座举行
- 16 《东学西渐的机遇与应对——从孔子学院谈起》学术讲座举行

## 研究进展

- 17 公共外交中的价值整合及其限度  
——以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对美公共外交为例
- 27 追溯湮没的学术史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的北宋政治史研究



## 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到访北京外国语大学 并发表《尼泊尔—中国关系：发展与繁荣 前景》的演讲

2017年3月26日下午，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并在阿语楼国会厅发表了题为《尼泊尔—中国关系：发展与繁荣前景》的演讲。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致欢迎辞，副校长闫国华主持演讲活动。

演讲开始前，彭龙会见普拉昌达总理，双方就进一步推进中尼两国教育文化交往进行会

谈。彭龙对普拉昌达总理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表示，北京外国语大学希望以此次总理到访为契机，加快尼泊尔语专业及尼泊尔研究中心的发展，加强与尼泊尔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学术及学生交流方面的合作，推动中尼教育文化交流。普拉昌达总理表示，很荣幸能够到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很期待与北外师生交流互动。他认为，





北京外国语大学完整的教学体系将培养出能对世界和平发展、人文交流、以及中尼关系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的高素质人才。

演讲环节，彭龙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中国与尼泊尔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法显、玄奘等众多高僧都曾到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其他国家的许多高僧也曾取道尼泊尔来到中国弘法。唐代时，尼泊尔尺尊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元代时，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在北京监造了著名的白塔寺，历史见证着中尼两国人民深厚的情谊和彼此的支持。2008年，普拉昌达总理阁下就曾作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出席了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九年后的今天，总理阁下再次来到北京，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续写了中尼人民友谊的新篇章。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与普拉昌达总理在印度果阿会见时，对打造中国尼泊尔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殷切期望，并强调了人文交流的重要性。

彭龙表示，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中国历史悠久、教授语种最多、学科齐全的外国语大学，

承担着服务中国外交大局，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时代使命。目前，学校开设有84种外语课程和对对象国研究。在2016年3月公布的《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学校共有三个学科的排名进入了全球前300名。其中，语言学排名51—100，现代语言排名51—100，英语语言文学排名201—250。这三个学科覆盖了学校所有外语专业，标志着学校外语学科进入全球一流学科行列。到2020年，北外开设的语种将超过100种，覆盖所有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进一步推动人类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北外始终重视南亚地区的语种建设和人文研究，建设有中国高等院校中规模最大的南亚语种群，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北外的南亚语种群开设语种最为齐全。为促进中尼两国人文交往，学校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尼泊尔语专业建设，对尼泊尔的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等在国内均处于领先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正式成立北京外国语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为尼泊尔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尼两国人文交往更好地贡献智慧与力量。很荣幸普拉昌达总理和各位贵宾能够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



普拉昌达



彭龙



普拉卡什·沙兰·马哈特

刻，相信这将成为北外尼泊尔研究的里程碑和新起点。

尼泊尔外长普拉卡什·沙兰·马哈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有 84 种外语课程并且在北外看到了尼泊尔语感到非常高兴。他在致辞中表示，今天成立的尼泊尔研究中心一定能够进一步加强中尼两国的关系。现在中尼两国关系以及发展和繁荣的前景对尼泊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而尼泊尔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虽然要面对政治动荡、健康医疗落后、贫困等问题，但尼泊尔欢迎全球化和自由化时代的到来，所有的国家共享繁荣才是我们共同的期愿。

马哈特表示，中尼有着传统的友谊，未来发展应该更进一步。希望中国对尼泊尔基础设施等进行更多的投资，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力量建设铁路、公路，包括跨境公路，希望继续加强人员交流和人文互动。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的倡议将世界各地联系起来，尤其是在非洲、东欧、南非、南亚等地区，尼泊尔希望受益于这一倡议。虽

然与中国相比，尼泊尔是一个小国，但是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尼泊尔并不小。尼泊尔民族多样、语言多样、生物多样、气候多样、地势多样，尼泊尔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宗教资源，旅游业有着巨大的潜力。总理所在的党派和外长本人所在的党派联合执政，保障宪法的执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投资者不必担心尼泊尔出现和平的中断，在稳定的政治体制下尼泊尔将会进入一个发展和繁荣的时代，年轻人将大有可为。

随后，普拉昌达总理、彭龙校长共同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揭牌。

普拉昌达总理在演讲中指出，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为世界瞩目，有着市场与技术方面的优势，中国现已成为尼泊尔在经济领域的强大助力，在经贸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了尼泊尔诸多帮助，尤其在尼泊尔地震灾后重建中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而尼泊尔在水电、旅游等领域拥有丰富资源可以进一步开发，双方未来在能源安全和技术转移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合作空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中国及包括尼泊尔在内



的邻国带来利好，更是中尼两国合作发展的契机。尼泊尔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如今仍是连接中国和南亚的重要桥梁。中国与南亚诸国应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极端主义与贫困问题，集中多方智慧，迎接“亚洲时代”的到来。

普拉昌达总理对北京外国语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中尼友谊源远流长，无论是在地缘、文化、贸易还是民间交流方面，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友好邻邦。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尼关系始终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济合作日益深化，人文交流不断增强。普拉昌达总理在发言中还强调了青年人在两国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他表示，目前越来越多的尼泊尔学生选择到中国留学，同时也有大批的中国学生选择到尼泊尔接受教育。两国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这些勤奋且充满创造力的年轻人定将在日后成为推动两国发展繁荣的中坚力量。总理本人将积极推动尼泊尔高校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演讲结束后，普拉昌达总理还针对北外学子提出的问题，与北外学子进行了现场交流。尼泊尔外交部秘书长胜科尔·达斯·白拉吉、驻华大使利拉·玛尼·鲍达尔等陪同来访。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于红、孟加拉国驻华大使法兹鲁尔·卡里姆、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卡鲁纳塞纳·科迪图瓦库、印度驻华使馆馆长施里·阿密特·纳让、中国前驻尼泊尔大使李德标，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相关职能部门、各院系师生共计 300 人参加了演讲活动。

尼泊尔总理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普拉昌达）是在 3 月 23 日至 29 日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受邀到访北京外国语大学。据悉，这是普拉昌达总理此行唯一的一场高校活动。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国际儒学论坛·2016”召开

2016年12月2日至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6”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儒家视域中的家国天下”。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瑞士等国家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副校长伊志宏，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文化部公使山本恭司等出席论坛。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姚新中，辅仁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福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院长陈金樑，韩国成均馆大学荣誉教授李东俊等中外知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开幕式由伊志宏主持。

刘伟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于长期以来支持论坛举办的朴仁国总长以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表示感谢。他指出，儒家传统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不能将传统文化仅仅当成博物馆里的历史遗物，传统文化是人类重要的思想资源；不能只是对传统文化做历史性的研究，要阐发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现实意义；不能将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只当成学者个人的工作，应当使其与当代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优秀传统文化为普通百姓所接受，进入百姓日常生活。

朴仁国指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东方人重要的精神家园，国际儒学论坛的举办旨在提供化解人类危机和冲突的可能性方案，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的智慧财富，汲取儒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厚德载物、仁爱爱人的思想，为人类提供有益的启示。

山本恭司对举办此次论坛的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表示敬意。他表示，儒家思想中“家国天下”的概念在日本同样自古流传至今，《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广为人知，成为政治和社会的根本理念，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希望各位专家通过本次论坛的深入探讨，对东亚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进一步加深各国间的人文交流。

杨朝明认为，儒学在今日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孔子所确立的价值观念依然是我们的立足点。今天我们思考家国天下的问题，尤其需要思考孔子思想、儒家学说的深层内涵，思考儒学与当今时代的深层联系。

张立文以《王霸之道与和合天下》为题作大会主旨报告。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和合智慧为“天下有道”的全球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一，构建和合共生机制，寻求和合天下正义；第二，构建同衷共济机制，寻求和合道体；第三，构建“民胞物与”的全球伙伴机制，寻求生存、价值、可能的和合世界；第四，构建创新包容、公平共享机制，寻求生活安全、和谐、幸福、自由；第五，构建知行合一的德礼机制，实现和合天下的人心和善。

陈来以《“仁者人也”新解》为题作大会主旨报告。他认为儒学不仅是“为己之学”，不仅具有修身意义，也是为他的伦理。为己之学，是就自身修养而言的；为他伦理，则是指向他人，指向他人就是爱人。自孔子以来，儒学一直包含两个方面的义理，为己意义上的修身与伦理意义

上的爱人。修身的人是指向自我，伦理的人则是指向他人。今天更应当强调伦理学意义上的人，亦即爱护他人。

陈福滨以《儒家的“忠恕”思想及其时代意义》为题作大会主旨报告。他认为忠恕是儒家修身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古典籍当中忠恕的论述博大精深，是含有万物的思想学说，也是待人处世方面不可或缺的正道，这样的正道在先贤的传承之下对我们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它的价值所在。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这种忠恕的思想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必须要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

李东俊认为，儒家思想一直就是修己治平之道，儒家虽然在外在方面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成为目标，但是在内在方面却是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前提完成的，并且端正心性使自己成熟，进而连接扩充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串田久治以《汉末儒家崔寔的统治论》为题作大会主旨报告，他认为韩非子曾经评判儒家，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崔寔受到韩非子的影响，但是不能简单地归为韩非子，他的思想中也有孟子的成分。韩非子不相信人性善，只强调法律不看重伦理，相反崔寔把对人的信赖作为基础。

本次论坛会期两天，共收到会议论文 95 篇，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儒家视域中的家国天下”这一主题，共进行了 18 场学术报告与学术讨论。

“国际儒学论坛”创办于 2004 年，已经连续举办了 12 届，已成为一个既是学术研讨、学术展示的平台，也是培育学术新秀的重要平台。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印度尼西亚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成立

2017年3月2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印度尼西亚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印尼人文交流与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图书馆举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更·拉哈尔佐、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于继海、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出席成立仪式并讲话，成立仪式由副校长贾文键主持。

彭龙表示，作为我国高等院校中历史悠久、教授语种最多、办学层次齐全的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北外围绕“一带一路”语种建设、区域国别与全球治理研究、人文交流机制智库建设，开展了多项工作。目前，学校已开设83种外国语言课程并建有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为进一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需求，北京外国语大学积极配合和参与前两次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会议，去年成功推动了中印尼高校智库联盟的成立，今年已经参与第三次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会议的筹备工作。

彭龙指出，中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和服务国家发展的重要举措。学校将大力支持中心发展，中心成立后，首要宗旨是资政服务，中心将加强与国内学者及印尼学者的合作，开展对两国政治、经济、社会、语言文化、民族宗教、人口与社会阶层、体育、教育、卫生、科技、媒体、

地方合作等领域的综合研究，为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建言献策。中心力争发展成为集基础研究、政策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库，积极服务两国人文交流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苏更·拉哈尔佐表示，北外作为中国知名学府，不仅校园环境优雅、设施现代，同时设置诸多学科专业，与印尼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北外的印尼语专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外交官、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有70多名印尼学生在北外学习中文、国际关系和商学。他指出，中国和印尼作为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的邻国，两国都拥有卓越的科技成就和先进理念，彼此间应互学互鉴，加强互动。两国如今注重人文层面交流，2015年召开首次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去年在贵阳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教育、林业、科技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今天，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的成立将再一次焕发两国教育与文化交流的活力，中心可以举办传统舞蹈等课程，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从而进一步推进两国在文化上、在民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新成立的中国—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一定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印尼研究基地，使馆将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心的活动。

于继海向中心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中国和印尼隔海相望，两国友谊源远流长。中



国和印尼在地区和多边层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繁荣发展、全面推动南南合作、应对全球性议题方面是重要合作伙伴。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的首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不仅是中国和印尼人文交流史上的里程碑，还对中国和东盟的人文交流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两年多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造福两国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文交流已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道，成为中国与印尼关系发展的三大支柱，成为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个大背景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中国—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适逢其时。他代表教育部希望中心能够强化自身建设，做好政策建议的“储备库”；整合各方资源，做好人才培

养的“蓄水池”；兼顾多边双边，做好区域合作的“助推器”；为全面推动两国人文交流朝着更加专业、更加务实和可持续发展方向提供更多智力支持，为拓展两国战略合作提供更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力量。

随后，苏更·拉哈尔佐大使、彭龙校长、于继海副司长共同为“中国—印度尼西亚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揭牌，彭龙为许利平、翟崑、吴杰伟、魏玲、张志洲、穆宏燕等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许宁宁、何胜、骆永昆等特聘研究员颁发了聘书。

2016年6月，北外协同华中师范大学、卡渣玛达大学等中印高校智库联合成立“中国—印尼高校智库联盟”。此次“中国—印度尼西亚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的成立，旨在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就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决议以及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联合公报精神。

来自外交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部委、高校、新闻及研究机构，以及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近3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成立大会开幕式，并随后参加了“‘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印

尼人文交流与智库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中印尼人文交流：机遇、挑战与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人文交流、智库建设”与“中国东南亚关系提质升级”三个主要议题展开了热烈、深入、全面的讨论与交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上升，中国人文外交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与多国建立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路径，是加强与外国民心相通的重要举措。

“中国—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将围绕中国—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发展需求、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需要，服务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东盟关系的发展，服务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东南亚的推进。中心将力争成为国家级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基地、学术交流高端平台、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基地，力争在国内外产生较强的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亚非学院





## 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成立

2017年3月23日上午，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太平洋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座谈会在行政楼举行。

中国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大使委员、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前会长、中国前驻加拿大大使梅平，天津市原副市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南开大学WTO研究中心主任王述祖，中国前驻拉脱维亚大使、前驻汤加王国大使胡业顺，《太平洋学报》编辑部主任潘峰，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前驻汤加王国大使高善海主持。

彭龙指出，北外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了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的历史使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更是围绕“一带一路”语种建设、区域国别与全球治理研究、人文交流机制和智库建设开展了多项工作。为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学校于2016年底成立了“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目的就是满足我国对于国别和区域研究、全球治理与发展、国际制度创新、公共外交与文明交流互鉴等问题的急迫战略需求。“太平洋研究中心”作为高等研究院成立的第一个研究中心，顺应了国际形势发展的态势，符合国家外交发展战略，



高善海



彭龙



梅平

为北外进一步做好国别与区域研究迈出了坚实一步。

梅平表示，中心的成立对加强对太平洋区域和南太岛国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心的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大部分都是具有南太岛国工作经历的资深领导和专家，为双边的外交、外事、经贸等方面做出过很多贡献，并建立了友好的交流互动关系，对中心进一步系统、科学的做好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李永辉表示，中心将努力集中各方资源做好相关研究。北外科研处处长张朝意表示，将积极支持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牛丽介绍了中心成立情况和工作计划。

随后，彭龙、梅平、王述祖、高善海、胡业顺、张朝意、李永辉共同为中心揭牌。

中心成立仪式结束后，“太平洋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座谈会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和嘉宾围绕太平洋地区研究的热点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不平衡，利益诉求多样化，在研究层面充满挑战，太平洋研究中心的成立恰逢其时。同时，专家学者也对太平洋中心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关研究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太平洋研究中心组织上隶属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依托高研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开展开放式研究。研究将覆盖太平洋区域政治、外交、投资、商贸、法律、语言、文化、旅游、历史等多个方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海洋研究中心、《太平洋学报》、当代世界出版社、国观智库等单位负责人、企业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学者、北外国际关系学院相关老师、太平洋中心成员等参加了活动。

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东南亚研究及学科建设研讨会举行

2017年1月14日上午，“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东南亚研究及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本次会议旨在促进北外东南亚研究学科创新发展，拓展该领域的综合性研究、跨学科研究，发挥更大的学术和政策影响力，更好地配合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会议主要涉及国内东南亚研究发展、“一带一路”与东南亚研究、北外亚非学院东南亚研究学科建设三大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贾德忠，外交部亚洲司信息与公共外交处梁建军参赞以及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孙有中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当前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国快速发展对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区域与全球问题研究提出了更多需求和更高要求。东南亚作为我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关键地区，中国官方、学界、商界对东南亚成果需求迅速的增长，迫切需要从学术研究角度和政策研究角度，深化对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的系统研究。北外顺应国家外交需要，于2016年成立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开

启北外区域与全球研究、人文交流研究的新篇章。此外，学校已建全所有东南亚国家官方语言，在东南亚语言文化教学与区域研究方面有着悠久历史和学术积淀，今后将进一步提升对东南亚地区的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水平，形成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力争成为国内外东南亚研究的重镇之一。

梁建军在致辞中回顾了过去一年中国周边外交、区域经贸合作、南海问题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相关成果，以及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复杂形势与各种挑战。对于此次研讨会，他表示，一是希望国内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互补，学术机构间要加强协同创新，形成合力；二是加强政府与智库间的沟通与协调，实现“一轨”与“二轨”的协作；三是鼓励智库与学者积极“走出去”，与东南亚国家智库和学者加强交流，最终打造懂政策、知国情、外语好、人脉广的学术团队。

贾德忠在发言中表示，当前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非通用语建设，力争实现与中国建交国家官方语言全覆盖，北外“十三五”规划将实现100种语言的建设目标。在这一重大机遇下，北外不断思考如何结合自身语言优势，打造国别与区域问题研究，做好学科定位，整合校内



外资源，以东南亚研究为突破口，充分利用自身的教师队伍与语言专长，建设有特色、有影响的北外东南亚研究学科，建设高水平、较权威的东南亚研究信息中心。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校内外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前副院长韩锋、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许利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翟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中心研究员何胜，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学峰，外交学院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魏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语系副主任史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清润，北京外国语大学马来西亚研究中心主任吴宗玉、亚非学院院长孙晓萌、亚非学院教授米良、国际关系学院

院长李永辉、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康敏。

与会专家就北外东南亚研究学科建设与布局、科研教学人才增量突破、教学体系与课程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科研学术发表与学科评价体系、外国语言优势和科研教学结合与转化、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周边外交等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综合论证，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取得了良好效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将继续推动东南亚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积极开展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努力提升对东南亚地区的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和人文交流的需要。

亚非学院



## 《俄罗斯前汉学时期的中国形象》 学术讲座举行



2016年12月5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和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全球视野中的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第九讲举行。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闫国栋教授做了题为《俄罗斯前汉学时期的中国形象》的学术讲座。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顾钧主持讲座，来自北外各院系及其他院校的师生济济一堂，聆听了本次讲座。

讲座主要围绕俄罗斯前汉学时期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闫国栋教授首先界定了“前汉学”的概念和时间范围，他认为，俄罗斯汉学整体

上经历了帝俄、苏联和当代俄罗斯三个时期，而在18世纪中期俄罗斯汉学发端之前，俄罗斯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前汉学”时期。俄罗斯“前汉学”时期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7世纪中期前，这个时期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是“遥远的记忆与诱人的传闻”；第二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上半期，这个时期基本上是俄罗斯“来华使节报告时期”。闫国栋教授以扎实的专业研究知识，用详实的文献史料和风趣的中国故事贯穿讲座始终，受到了现场师生的欢迎。讲座之后，闫国栋教授热情地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与在场的师生进行了交流。

闫国栋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汉学、俄罗斯人中国观、汉籍俄译、中国俄罗斯学史等与中俄文化交流相关领域的研究，出版有《俄罗斯汉学史》等著作（包括主编、合译、参著等）17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80余篇。担任《俄罗斯文艺》、《汉学研究》、《海外中国学评论》、《中国学》编委、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学报》外籍编委。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 《东学西渐的机遇与应对——从孔子学院谈起》学术讲座举行

2016年12月8日，“全球视野中的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第十讲举行。美籍华人学者、美国布莱斯雷根世界中国学研究院院长阎伟红教授做了题为《东学西渐的机遇与应对——从孔子学院谈起》的学术讲座。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顾钧主持了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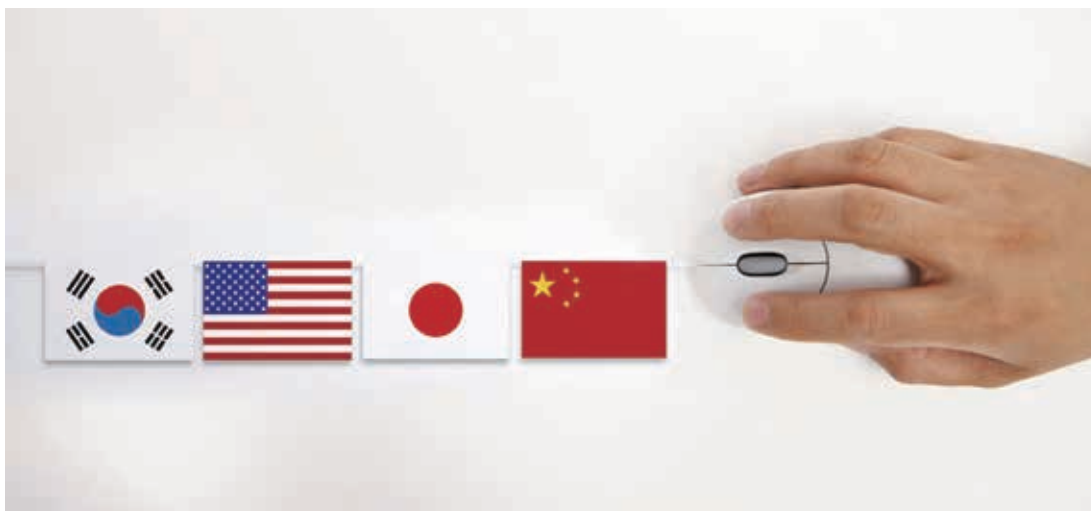
阎伟红教授曾担任美国北卡州费佛尔大学文学院教授，作为创办者，主理该大学孔子学院多年。他以作为孔子学院院长、教授和传播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亲身经历，对北美孔子学院的发展及现状做了一次历史性的回顾。他认为，在国家汉办的大力推动下，全球孔子学院，尤其在北美地区，其规模和容量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在本地化战略上，目前在北美的孔子学院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重新考虑和调整，使之更为有效地与当地的民众和学生对接融合。阎教授介绍了自己在担任孔子学院院长期间开展的各种推广中国传统艺术的项目，包括导演制作的大型“书法—歌剧”的创新秀、出版中国书法的设计书籍、推动中国书法走进大中小学的课堂等。他通过回顾自己对中国艺术在美国推广的经历，思考如何将美国学生认为“鸡爪子”一般的中国书法介绍推广到普通美国民众的文化生活中去。接受和认同一种来自异域的艺术对美国民众来说并非易事，阎教授深入思考美国教育的诸多层面，从别具一格的角度



切入，成功将以中国书法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融合到西方受众的文化心理中，得到当地民众的良好反响。

阎伟红以幽默的口吻讲述了中国文化如何在美国得以推广，展现了几段趣味横生而又内涵深刻的影片，与在场的听众展开了轻松良好的互动。提问环节中，多名同学从中国文化的概念到具体的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阎教授一一做了解答。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 公共外交中的价值整合及其限度 ——以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对美公共外交为例<sup>1</sup>

史泽华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陈欢 / 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摘要

价值整合是公共外交中的关键环节。在韩国与日本就“慰安妇”问题对美公共外交竞争中，“历史真相派”通过院外游说、政治宣传、立碑造像等活动，成功地把该问题打造成为美国主流社会接纳并具备强大文化嵌入能力的社会运动，获得了对“历史修正派”的相对优势，并进而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由此，公共外交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结合对象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客观定位价值整合的内容、工具、对象和目标，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

### 关键词

“慰安妇”问题 公共外交 价值整合 韩美关系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二战史观与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对日本外交”的研究成果。

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为争取他国民心而采取的公关行动”。<sup>1</sup>但是，国家间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及国情国力等基本领域有所不同是一种自然状态，即便是在同一社会内部，不同群体对利益的认知状况、解释和表述方式、选择和排序方式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公共外交，要想收获良好的绩效，就必须在两个有诸多差异的社会系统间尽可能多地寻求共同价值、培育共识共鸣、引导对象国社会舆论向本国倾斜，进而促使对象国政府政策的转轨或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作为一项“民心工程”的公共外交，其成败不仅取决于目标国对价值目标的设置和包装，更取决于这一价值在对象国内部如何汇入、整合及向政策领域传导。

在国内政治中，意识形态就像团结统一的“水泥”，一个政党要靠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成为一个“历史集团”，从而使社会成为统一体。<sup>2</sup>国内政治系统的价值整合，既可以选择开放、宽容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强制、对抗的方式。但在公共外交中，本国政治权威在对象国社会中缺乏足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价值整合的内涵只能以最低限度共识为基础，价值整合的方式也只有和平、包容一种。换句

**“慰安妇”在历史事实上确凿无疑，二战期间至少 40 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

话说，公共外交在对象国所面临的价值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公共外交以外来价值的面目进入对象国，对“亲我公众”进行强化、对“摇摆公众”加以催化，对“敌对公众”施行改变。<sup>3</sup>但其成功，终究要以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对象国主流文化圈为基础，而不是大跃进式地直接另起炉灶或改造对方。过去十几年来，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对美国展开的公关和游说活动，是众多公共外交案例中价值整合较为成功的一个。

“慰安妇”在历史事实上确凿无疑，二战期间至少 40 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受害者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sup>4</sup>但是，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彻底反省，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更是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反省道

歉有损日本人的荣耀，因此，应该把是否存在强征的问题矮化，甚至把问题本身隐藏起来。<sup>5</sup>而美国，作为二战的亲历者，政府及主流社会就“慰安妇”问题的事实本无多大歧义，但美国同时又是战后秩序的设计者和民主化后日本的盟友，需要在保持日本的可控性和不刺激日本的战败情结之间寻求平衡。由此，在日本的长期游说和公关下，美国从政府到社会，长期把“慰安妇”问题置于边缘化状态。

而在受害国中，韩国也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友，但长期为邻国日本不正视历史问题所困。为了伸张正义，韩国除了通过政府外交途径对日施压外，还推动成立了专门性的非政府组织，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便已成立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会”等，把历史事实和韩国主张带入国际社会，促成国际舆论的关注及对日迂回施压。在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压力下，日本政府前后有了“河野谈话”、设立“亚洲妇女基金”等行动。但是，日本国内外“历史修正派”的杂音一直未断，他们对历史事实越来越肆无忌惮的篡改活动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对二战历史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在美国，甚至有超过七成的年轻人认为可以把日本在二战中所犯罪行

1 曲星：《公共外交的经典含义与中国特色》，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第4—10页。

2 【希腊】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8页。

3 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7—209页。

4 苏智良：《“慰安妇”问题的过去与近况》，载《百年潮》2007年第10期，第60—65页。

5 【日】山田郎著：《日本如何面对历史》，李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放下”。<sup>1</sup> 本世纪以来韩国就“慰安妇”问题的对美公共外交，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

本文拟以本世纪以来韩国为还原“慰安妇”问题真相而在美进行的“争取民心”过程为分析个案，观察价值整合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作用及其限度。

### 一、“历史真相派”就“慰安妇”问题在美司法诉讼和立法游说活动

在个人自由、生而平等、代议民主、多党制、人权等西方价值方面，美韩日有一些基本共识，这为韩日在美公共外交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慰安妇”问题上，韩国政府及美国“亲韩”政治精英、社会组织及民间力量共同组成了“历史真相派”。<sup>2</sup> “历史真相派”在美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压，促使后者诚恳道歉、做出赔偿。而由日本右翼政府、右翼势力及其在美支持者所构成的“历史修正派”，是“历史真相派”行动的主要反对者。<sup>3</sup> 在技术和攻击层面上，双方能力旗鼓相当，但在文化与价值层面，立场针锋相对。

2000年9月18日，15名来自韩国、菲律宾、中国的幸存“慰安妇”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会地区法院以战争罪联名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后者正式道歉并做出赔偿。此举揭开了本世纪以来“历史真相派”在美公共外交活动的序幕。但次年10月，该法院以不具管辖权为名拒绝受理此案。法官小亨利·肯尼迪称，日本是主权国家，对美国国会法律体系具有豁免权，美国法院无权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及做出赔偿。而且，“慰安妇”问题是一个已经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问题”，法院在这类问题上“不是合适的平台”。<sup>4</sup> 就这样，美国法院以主权豁免和不介

入政治荆棘两个理由轻松地阻断了“慰安妇”问题在美解决的司法通道。

事实上，管辖权问题更多是一种托辞。小亨利·肯尼迪在判词中表达了对二战期间日军所犯罪行的谴责，代表了不少美国民众对“慰安妇”问题的真实看法。而日本政府代理律师克雷格·胡佛拒绝发表任何评论的做法则代表着另外一些美国人对此事的态度——美国在此事上的介入有损美日关系，不符合国家利益。在美国，不少民主党自由派学者和政界人士都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应涵盖人权与民主这类价值观，因为这类价值观是“一种无形的国家利益”。但在很多共和党保守派看来，国家利益不应限定过宽，以免把美国带入无休止的国际纷争中去。正是价值至上主义者和利益至上主义者的这种认知分歧，让日本有了可乘之机。

司法程序的失败激怒了一些“慰安妇”诉讼的支持者。“洛杉矶韩国资源中心”组织执行主任沈寅普称，“我们震惊并失望。她们（慰安妇）把法庭看成了最后的希望。”<sup>5</sup> 但司法程序的失败也并非一无是处，它进一步让韩国人看清了谁是可争取的力量。而且，随着抗议者的声音，“慰安妇”问题开始步入更广阔的社会视野。

1 “Americans, Japanese: Mutual Respect 7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WII”, <http://www.pewglobal.org>, April 7, 2015.

2 据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48%的日本国民认为本国已经为二战期间的军事行动“充分道歉”，15%认为“没有必要道歉”。

3 “Americans, Japanese: Mutual Respect 7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WII”, <http://www.pewglobal.org>, April 7, 2015.

4 Kang K. Connie, “Judge Dismisses Suit by Japan’s Ex-Sex Slaves”,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5, 2001.

5 同上。

几乎与诉讼同步，民主党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莱恩·埃文斯正式向美国国会提交 H. Con. Res. 357 议案，要求向日本政府施压，为二战期间所犯战争罪行道歉，向受害者赔偿。埃文斯是国会众议院“最自由派”的数名议员之一，在民主党内被誉为关注人权问题的“平民英雄”，与选区内韩裔群体关系良好。但由于受关注度不足及“历史修正派”的阻挠，这次提案与接下来的 2001 年 H. Con. Res. 195、2003 年 H. Con. Res. 226、2005 年 H. Con. Res. 68 三次提案一样，都遭遇挫折。

在法案连败连提的背后，是“历史真相派”与“历史修正派”之间在美国的对抗性公共外交活动。支持者中，“亲韩”的韩裔群体出力最多，一些组织多次安排“慰安妇”幸存者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会，向国会议员们讲述历史事实。反对者中，2005 年 H. Con. Res. 68 议案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后，这些势力利用各种渠道对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展开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阻止了全体会议对该议案的表决。

埃文斯因健康原因未在 2006 年选举中谋求连任，曾作为二战期间被关押日裔的迈克·本田接过了“慰安妇”问题的提案接力棒。2007 年 1 月，本田与民主党国会同僚戴安娜·沃森、

表一 2000—2005 年美国国会有关“慰安妇”议案

时间	议案名称	联合发起人	状态
2000年	H. Con. Res. 357	46位	搁置
2001年	H. Con. Res. 195	27位	搁置
2003年	H. Con. Res. 226	32位	搁置
2005年	H. Con. Res. 68	15位	搁置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 ([http://Thomas.loc.gov/home/bills\\_res.html](http://Thomas.loc.gov/home/bills_res.html))

菲利普·黑尔、吴振伟、马德琳·博尔达洛及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兰德尔·罗伊斯共同向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交了 H.Res.121 议案，要求日本政府以“明确无误的方式”承认二战中“慰安妇”角色，正式道歉，承担历史责任。2 月，三名幸存的韩国“慰安妇”也受邀出席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保护‘慰安妇’人权”听证会，讲述了日军罪行。

但是，日本首相安倍 3 月发表谈话称，“没有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强征慰安妇”，<sup>1</sup> 安倍所言激起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也搅动了美国国内社会舆论，白宫也决定向日方施加一定的压力。4 月底，安倍访美时不得不就“慰安妇”问题向总统小布什表示“道歉”，但拒绝直接向“慰安妇”道歉。同时，安倍还与新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等国会领袖沟通，试图阻止“慰安妇”

问题的进一步发酵。自民党议员联盟“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委员会”也决定派出下属议员访美，该议员团为应对 H.Res.121 议案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重新审视“河野谈话”并要求政府修正这一立场。为了阻止 H. Res. 121 议案，日本政府还以每月 6 万美元的高价聘请顶级说客鲍勃·迈克尔进行游说活动。鲍勃曾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任职 38 年，其中还有 14 年担任共和党少数派领袖。<sup>2</sup> 在“历史修正派”的共同阻碍下，外交委员会取消了原定 5 月下旬表决 H. Res. 121 议案的日程。

正当 H.Res.121 在国会讨论时，44 名日本国会议员和 19 名日本“名记者”、“名评论家”、“知名教授”等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广告，再次否认强征“慰安妇”。广告中罗列了大量“真相”：“没有历史文件显示，

1 Onishi Norimitsu, "Japan Repeats Denial of Role in World War II Sex Slaver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07.

2 Silverstein Ken, "Cold Comfort: The Japan Lobby Blocks Congressional Resolution on World War II Sex Slave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ume 4, Issue 10, Number 0 (?), October 2006.

日军曾违反妇女意志，强迫她们成为慰安妇；“慰安妇是公娼，在当时是普遍现象”，等等。它甚至宣称，许多“慰安妇”“挣钱比日本军官还多，甚至比将军们还多”。H. Res.121 议案表决前夕，日本驻美大使加藤良三专门致信众议院数名关键议员，称如果议案通过将美日盟友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暗示此举将影响日本对美国伊拉克政策的支持。<sup>1</sup> 这些明显违背事实的说法激起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反感，促使提案进入表决快车道。2007年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 H. Res. 121 议案。

H. Res. 121 议案的通过标志着“历史真相派”在美国立法机构的重大突破，并带动荷兰、加拿大议会以及欧洲议会先后通过了同类议案，日本的国际形象在不少地方遭遇滑铁卢。不过，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不仅积极利用首相、高官、议会代表团访问、使馆发布声明、地方政府间直接交涉等传统政府外交渠道，而且通过聘请美国公关公司游说关键议员、雇佣美国前政府高官做专职说客、在美国主流媒体刊登政治广告等公共外交渠道，以确保“慰安妇”问题受阻于美国政治决策圈之外，且不让该问题成为美国公众舆论之焦点。计划之缜密、策略之周全、行动之快速、重点之突出，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历

**司法诉讼渠道不通畅，立法决议通过困难且效力被严重弱化，“历史真相派”通过改变精英阶层立场来实现公共外交目标的梦想破灭了，新的突破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更坚实的“群众基础”。**

史修正派”将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综合运用能力。

美国立法机构被“攻克”，很大程度上与更重视人权问题的民主党2006年中期选举后再次掌控众议院有关，议长南希·佩洛西对“慰安妇”问题的议案一直持“同情”立场，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也表示不反对。而且，与以前的议案相比，H. Res. 121 更强调人权和妇女权利，要求防止类似日军征用“慰安妇”那样以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卖。但出于利益权衡和平衡的需求，美国政治上层总体上对“慰安妇”问题仍不够积极，最终通过的版本额外添加了不少肯定日美同盟重要性的内容。通过议案，更多的议员只想就此给日本“提个醒”，不让她认为美国可以被牵着鼻子走，但核心意思仍是“面向未来”，而不是“以史为鉴”。

## 二、“历史真相派”推动在美建造“慰安妇”纪念碑及塑像运动

司法诉讼渠道不通畅，立法决议通过困难且效力被严重弱化，“历史真相派”通过改变精英阶层立场来实现公共外交目标的梦想破灭了，新的突破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更坚实的“群众基础”。H. Res. 121 议案通过后，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在美国的公共外交策略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一是放低公关“重心”，二是加强组织建设，三是重视价值“包装”，四是推进价值“物化”。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在全美各地建造“慰安妇”纪念碑及塑像的活动。2011年8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韩国政府不努力解决“慰安妇”受害者索赔权纠纷，构成违宪。之后，无论是政府外交层面，还是公共外交层面，韩国政府对该问题的姿态都更加积极起来。

美国韩裔为第五大亚裔群体，人口达170多万，但零散在50个州中。这样的人口比例，“去影响国会议员是相当困难的，在地方层面活动则要有效的多。”<sup>2</sup> H. Res. 121 议案通过后，“历史真相派”以加州韩裔聚居选区为依托，发起成立了“加州韩裔美国人论坛”，旨在引起公众对“慰安妇”问题的重视，促成日本政府正式的道歉。由“论坛”牵头，还成立了“H. Res. 121 民间国际联盟”，将有关国家的近

1 Blaine Harden, “Japan Warns U.S. House Against Resolution on WWII Sex Slaves”, *Washington Post*, July 18, 2007.

2 Alicia P.Q Wittmeyer, “The ‘Comfort Women’ Lobby”, <http://foreignpolicy.com>, February 20, 2014.



200 个相关组织联合了起来, 扩展“慰安妇”问题的国际关注度。<sup>1</sup> 此后, 一些致力于为“慰安妇”伸张正义的社会组织, 纷纷建立官方网站, 举办纪念活动, 推送文章、图片、漫画等, 及时发布“慰安妇”问题的政治进展。韩国政府和主流媒体也在后方不断加油鼓劲, 与前方力量之间保持默契。

“历史真相派”还在美国主流文化圈寻求突破口, 把“慰安妇问题”与人权、女权和少数族裔平等权利问题挂钩, 让围绕该问题的斗争成为左翼平等权利运动的一部分, 话语方式适度转移, 在民主党自由派阵营内有了更强的存在感, 与其他左翼社会运动有了搭便车或抱团取暖的可能性, “朋友圈”得以不断壮大。本田在提案时称, “提出这项决议的目的, 并非要羞辱日本政府, 而是在帮助日本, 是为了曾经受过这种暴行而尚生存的少数妇女伸张正义, 也将这些日军当时违反人道问题而掩饰这么多年的历史真相公之于世。”

为了让“慰安妇”问题在美国社会留下更深厚的文化印迹, 一些在美韩裔群体开始着手策划在公园、学院等场所树立“慰安妇”纪念碑和塑像的运动(以下简称“造像”运动)。活

### 为了让“慰安妇”问题在美国社会留下更深厚的文化印迹, 一些在美韩裔群体开始着手策划在公园、学院等场所树立“慰安妇”纪念碑和塑像的运动。

动组织者拟在全美树立 20 座纪念碑或塑像, 为日军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留下更多历史印迹, 让“慰安妇”问题变成当地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美国新泽西州帕利塞兹帕克市, 韩裔美国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他们不仅通过政治募捐的形式参政, 还亲自推举候选人角逐公职席位, 影响力不断上升。<sup>2</sup> 美国首座“慰安妇”纪念碑于 2010 年在该市落成。随后, 纽约、新泽西、弗吉尼亚等地一些韩裔人口较多、政治活动力强的地方也纷纷立碑造像。这些地方的行政首脑和地方议员们, 要么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不满, 要么为了留住韩裔手中的选票, 多对此采取支持或默认态度。

2012 年 5 月, 美国白宫在线请愿网站上出现了抗议设立“慰安妇”纪

念碑的请愿, 称其为对日本人的侮辱。两个月内签名者达 3 万余人, 当地日本领事馆官员否认日本官方参与了此次活动的策划, 但有专家表示, 日本国内最大的保守组织在其官网上详细列举了网上请愿签名的步骤。<sup>3</sup> 据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消息, 日本政府在 2012—2013 年至少聘请了两家公关公司, 向其分别支付了 52.3 万美元和 19.5 万美元的报酬, 让其追踪“慰安妇”问题的动态, 包括国会对这一问题的表态, 以及各州建立慰安妇纪念碑的状况、广告、立法等。<sup>4</sup> 2012 年底安倍二次上台后, 有日本政府撑腰的“历史修正派”更加气焰嚣张。安倍称, “没有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在其占领的地区, 直接参与绑架和强迫妇女卖淫”, 并暗示将修改“河野谈话”。<sup>5</sup> 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表示, “在当时慰安妇制度是维持军队纪律的必要存在。”<sup>6</sup> 日本广播协会新会长舛冈胜人也认为, 哪个国家都曾存在“慰安妇”, 不应只批评日本。

在“韩一格姐妹城市协会”组织及一些韩裔的推动下, 美国加州格伦代尔市议会在 2013 年 8 月通过决议, 决定在中央公园建造全美首座与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的“慰安妇”铜像一

1 Kinue Tokudome, Passage of H. Res. 121 on 'Comfort Women', "The US Congress and Historical Memory in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ume 5, Issue 8, Number 0. August 30, 2007.  
 2 Rebecca D. O'Brien, "New Jersey's Korean Community Awakens Politically", <http://archive.northjersey.com/>, October 14, 2012.  
 3 Monsy Alvarado, "Palisades Park Monument to 'Comfort Women' Stirs Support, Anger," <http://archive.northjersey.com/>, July 12, 2012.  
 4 Kevin Bogardus, "Japan Turns to K Street Amid Calls for Apology on WWII-era 'Comfort Women' ", <http://thehill.com/>, February 6, 2014.  
 5 Clint Richards, "Could Japan Still Revise 'Comfort Women' Statement?", <http://thediplomat.com/>, October 9, 2014.  
 6 Zachary Keck, "Hashimoto Calls 'Comfort Women' Necessary", <http://thediplomat.com/>, May 15, 2013.



样的铜像。与立碑相比,塑像以更直观、古典的方式让“慰安妇”问题融入美国历史文化。“慰安妇”塑像作为“被压迫者的塑像”而修建,立在大学和公园里,和马丁·路德·金等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及黑人运动员的塑像一样,着重强调“政治性的少数族裔权利诉求”,这是对美国人来说很容易看明白的理念。在格伦代尔,韩裔人口只占总人数的0.3%,与占0.2%的日裔相差无几,韩裔人士战略性地提出的“人权问题”,迎合了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白人中产阶级,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出现了基于少数族裔立场重新记述历史的社会运动,在这一大趋势之下,慰安妇塑像不断增加。<sup>1</sup>为了减少敌意,支持者表示,设立这个铜像并非是要挑起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敌意,也不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反对,它是对人权的保护。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那段黑暗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sup>2</sup>

格伦代尔市的造像消息一出,立即遭到了“历史修正派”的各种阻挠。该市市长表示,议案表决前,他收到了数百封邮件,绝大多数都在否认强征“慰安妇”的事实,要求美国地方城市不介入日、韩之间的事务。有人



甚至称,大部分“慰安妇”都是自愿的,关于慰安妇的人数统计是虚假宣传,当前“慰安妇”问题的性质已经被扭曲和夸大,在公园修建“慰安妇”铜像是对日本人声誉的毁谤。<sup>3</sup>一些日裔美国人亲自来到市议会抗议,“历史真相全球联盟”组织及其支持者还向美国地方法院起诉,指责立像行为超越了地方政府权限,侵犯了联邦政府专有外交权责,违反了美国宪法。<sup>4</sup>另外还有人打出来“同情牌”,称“慰安妇”铜像的建立,让当地日裔居民的孩子经常受到韩国人的欺负。韩国人说慰安妇问题是个人权问题,但是塑像行动只能导致新的冲突,因为这意味着对日本人的种族歧视。<sup>5</sup>

日本东大阪市与格伦代尔市是“姐妹城市”。该年11月,东大阪市一名议员表示,大部分市议会议员都想与格伦代尔断绝联系,要修复双方关系除非移除铜像。<sup>6</sup>次月,三位日本维新会国会众议员到访洛杉矶时称,“慰安妇”铜像的设立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形象,日方要求拆除该铜像。他们希望日本外务省能够对慰安妇制度重新界定,并收回90年代的道歉。<sup>7</sup>该年年底,“历史修正派”在白宫请愿网站申请,要求拆除格伦代尔的“慰安妇”雕塑,签名人数在不足一个月内便突破了10万。请愿者称,这是“一尊伪装成和平雕塑的慰安妇铜像,其碑文是在煽动对日本和日本人民的仇恨”。

“历史修正派”破坏了一些美国地方政府的立碑造像计划,但在纪念碑和雕像已经建成的地方,“历史真相派”保存了胜利的果实。在格伦代尔市,联邦地区法院驳回了关于“拆像”的诉讼请求。这段时间内,“历史真相派”在美国以韩裔聚居选区为依托,通过“造像”运动使“慰安妇”问题成为美国主流文化圈所接纳且具有一定文化嵌入能力的社会运动,成功扭转了前些年在美国立法和司法机构相对被动

1 兼松雄一郎:《韩裔和日裔在美国掀起形象战》,日本经济新闻,2014年8月2日。

2 Brittany Levine, “Statue Honoring WW II-era Sex Slaves Coming to Glendale”,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6, 2013.

3 Carol J. Williams, “Japanese Nationalist Protest of ‘Comfort Women’ Sculpture Fails”, *Los Angeles Times*, July 9, 2013.

4 Brittany Levine, “Lawsuit Seeks Removal of Glendale ‘Comfort Women’ Statu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22, 2014.

5 Eric Johnston, “‘Comfort women’ Statues Spur Debate”, *The Japan Times*, February 27, 2014.

6 Brittany Levine, “Japanese Councilman Opposes Glendale’s ‘Comfort Women’ Memorial”,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8, 2013.

7 Brittany Levine, “Japanese Politicians Want Glendale’s ‘Comfort Women’ Statue Removed”,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19, 2013.

的局面，掌握了“慰安妇”问题议程设置的主导权。在他们的努力下，“慰安妇”问题甚至被写进了加州中学历史教科书。<sup>1</sup>

### 三、美国政府立场的转变及韩日就“慰安妇”问题初步妥协的达成

小布什时期，“慰安妇”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更多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外交问题”。为了不让历史问题干扰美国对外政策大局、动摇美日韩三角同盟的稳定性，美国政府一直坚持“不偏不倚”、息事宁人的态度。在“慰安妇”问题上，安倍 2007 年访美时稍一低头，小布什政府马上给予了积极回应。布什称，他与安倍就该问题私下交换了意见，安倍把心里话告诉给了他，他很欣赏对方的坦率。“慰安妇”问题是世界历史上令人遗憾的一章，他接受安倍首相的道歉。韩国之前的抗议及游说，实际上并未触动小布什政府的神经，该政府更想要的，是通过替安倍政府“平事”来换取对方投桃报李、强化日美同盟的实际行动。

奥巴马执政后，在“历史真相派”的努力下，“慰安妇”问题变成了一个不进行外交疏导便无法解决的“内政问题”。同时，美国也禁不起两个主要亚洲盟友之间围绕该问题的长时间争吵。是以，美国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介入积极了很多，对日立场也逐渐强硬了一些。2012 年 7 月有媒体称，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要求美国所有文件和声明禁用按日语直译的“慰安妇”一词，而将其改成“被强迫的性奴”。2014 年 1 月，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包括慰安妇问题决议案的美国政府 2014 财政年度预算案。该决议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负起历史及政治责任、做出正式道歉。与以往众议院通过的类似法案一样，该决议案不具法律效力，却是美国参众两院首次通过的涉及慰安妇问题的法案，意味着美国立法机构向“历史真相派”的全面倒戈。随后，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法案。

这期间，日本政府及其领导的“历史修正派”也一直在积极努力抵消议

案通过的负面影响，包括委派国家安全顾问谷内正太郎赴美游说要求美国出版商修改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内容等，但未取得明显的效果。出于现实利益考虑，奥巴马未对日本做出公开批评、外交抗议等激烈性举动，但也数次通过“外交非正式途径”表示对此事的“关切”。由于美国政府施压，日本政府 2014 年 3 月宣布放弃修改“河野谈话”。4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韩国，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日军的“慰安妇”制度严重侵犯了人权，“慰安妇”应当被倾听、被尊重，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应当清晰，他还呼吁安倍政府正视历史。<sup>2</sup> 同月，韩日就“慰安妇”问题局长级会谈正式启动。

1 Victoria Kim, “‘Comfort Women’ and a Lesson in How History is Shaped in California Textbooks”,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7, 2016.

2 “Pres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Park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 April 25, 2014.

经过十几次外交谈判及首脑互访，韩日 2015 年底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安倍以首相的名义向“慰安妇”受害者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韩方发起“和解与愈合基金会”，日方向基金会注资 10 亿日元，但日方出资是日韩合作项目，而不是国家赔偿。若日方能切实履行上述承诺，韩方将确认“慰安妇”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协议达成前，“历史真相派”在美就“慰安妇”问题的公共外交活动一直在持续。2015 年 3 月安倍访美并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前夕，韩裔群体在美国《国会山报》刊登了题为“安倍必须道歉”的整版广告。“华盛顿慰安妇问题联盟”组织则先安排一位幸存“慰安妇”出席该组织在国会举行的记者会，向媒体讲述其受害经历，后策划举办了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慰安妇和平纪念园”建园 1 周年纪念活动，邀请本田发表演讲，同时播放与“慰安妇”问题相关的影视作品。“加州韩裔美国人论坛”组织也举办了周年晚宴，安排公众与幸存慰安妇见面，并在加州富勒顿博物馆举行了与“慰安妇”相关的作品展览，包括绘画、数字影像和照片等。

安倍演讲前一天，《纽约时报》发

**但实际上，协议未能像美国希望的那样让韩日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在如何处置韩国对美公共外交成果——“慰安妇”塑像问题上，协议只是开启了双方的新一轮竞争而已。**

表社论称，安倍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安倍是否或有多大诚意正视日本的战争历史，包括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定，对中国和韩国残酷的占领，日本的暴行以及强征大批年轻妇女充当‘慰安妇’在战时的妓院里充当性奴隶。”本田在国会会议发言时称，安倍应利用演讲机会代表日本政府作出“完整、明确和正式”的道歉。以本田为首的 24 位两党国会众议员集体致信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敦促安倍以切实行动为“和解”奠定基础。同年美国国会调查局发布的报告也指出，日本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的争议性态度将伤害美国的利益，影响亚洲地区的稳定，<sup>1</sup>同时该报告还肯定了在美韩裔群体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如设立纪念碑、命名

街道、纪念受害者等，推动了“慰安妇”问题在美国国内逐渐被了解。<sup>2</sup>

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的达成被许多观察者视为美国的胜利。<sup>3</sup>因为这表明美国有能力把韩日纠葛变成了“家务事”来处理，韩国不会另寻出路、与中国结成“联合战线”，便不会深度破坏美日韩三角同盟的稳定性，东亚地区的外交版图便不会偏离美国预设的轨道。但实际上，协议未能像美国希望的那样让韩日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在如何处置韩国对美公共外交成果——“慰安妇”塑像问题上，协议只是开启了双方的新一轮竞争而已。协议签订后，“历史真相派”把第 1212 次“周三集会”扩展到了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 10 个国家和 30 个地区。<sup>4</sup>支持者称，在日本做出“法律赔偿”之前，他们是不会妥协的。<sup>5</sup>据 2016 年 5 月的韩国民调结果，只有 21% 的韩国民众对协议持正面评价，反对者则达到了 73%。<sup>6</sup>

“造像”运动确实让“历史修正派”咽下了一只苍蝇：塑像成了既成事实，日韩对美外交竞争中的攻守之势逆转。日本若想拆像、翻案，需要同时搬动韩美两块“石头”。日本想通过向基金会注资换取韩国拆除世界各地的塑

1 Pamela Constable, “70 Years Later, a Korean ‘Comfort Woman’ Demands Apology from Japan”,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2, 2015.

2 Emma Chanlett-Avery, “Japan-U.S. Relations: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3, 2015.

3 Mikyoung Kim, “US is Big Winner in Comfort Women Deal”, *Korea Times*, January 21, 2016.

4 自 1992 年 1 月 8 日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韩国时开始，“历史真相派”每周三都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进行的抗议集会，被称作“周三集会”，堪称单一主题全球最长期集会。

5 韩慰安妇“周三集会”迎 24 周年，《谴责韩日慰安妇协议》，《东亚日报》2016 年 1 月 6 日。

6 日军慰安妇问题协议：韩国是不同意，日本是赞同多。<http://m.news.naver.com/>，2016 年 5 月 12 日。



像，但承受民间和在野党巨大压力的韩国政府称，这根本就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问题，不属于双边协议的效力范畴，即便拆像，也要征得立像者的同意，不是韩国政府权责，也不是韩日政府间会谈能搞定的。<sup>1</sup>

#### 四、结论

本案例中，韩国透过公共外交较为成功地推动了“慰安妇”问题在美国政治系统内从外来到本土、从边缘到中心、由上层到下层的传播和传导，直至深度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决策，起到了传统政府外交难以起到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指出，最有效的公共外交案例是在政府退居幕后或授权他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实现的。<sup>2</sup>

据2015年皮尤中心的民调，在日本为二战罪行道歉问题上，只有29%的美国公众认为“不充分”，而37%认为“已经充分”，24%认为“目前无必要”。<sup>3</sup>由于缺乏历史数据，这一调研结果无法用来证明韩国对美公共外交近年来的进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相对于“历史修正派”，“历史真相派”在力量上并不占优势。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历史真相派”的行动还能牵动美国对日政策变轨，显然已经把自身的价值整合和舆论影响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日本的挫折，更多不



在于工具层面的落后，而在于价值层面的偏差。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拒绝历史真相的态度，既有悖于正义，也不符合人类社会普遍价值观念，因此尽管该国调动大量外交资源发起对美公关，也难以长期掩盖和歪曲事实、左右主流舆论。

由此，价值整合是公共外交中不可不重视的关键环节。否则，无论是价值整合内容存在瑕疵（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和人类共同价值）、价值整合对象选择的失当（如更重视精英政治而非大众政治）、价值整合手段运用不够充分（政府推动公共外交的决心不

够或未找到合适的政治动员方法），还是价值整合结果失衡（如所推共同价值在对象国主流价值体系中的权重不高），都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失败。在本案例中，“历史真相派”在价值整合的每一个环节都经历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尝试，特别是找到了深入美国社会主流文化圈和铭记历史文化标识的有效方法，才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对象国社会文化环境、利益取舍、价值取向和行动选择复杂多元的背景下，通过价值整合占领舆论高地尚有可能，谋求“全体一致”则有失客观，寻求以“新价值”取代或同化“旧价值”更是盲目乐观。如果外来价值的导入引发对象国社会激烈的价值冲突或严重政治认同危机，精英阶层完全有可能在感知、观察、应变的过程中随时打断这一进程，进而引发严重的公共外交危机，甚至把公共外交本身的价值毁掉。从此角度看，公共外交中的价值整合必须基于客观事实而非主观需求，可以寻求整合的最大化，却无法奢求超越现实的无限化。本案例中韩国政府见好就收，宁愿违背本国主流民意也不愿再给美国政府“找麻烦”，其背后也是价值整合难以再进一步的骨感现实。

1 Hana Rudolph, "How to Save the Comfort Women Agreement", <http://thediplomat.com/>, April 14, 2016.

2 卡尔·尼古拉、斯钟新、陆佳怡：《公共外交以史为鉴的七条法则》，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第6—10页。

3 "Americans, Japanese: Mutual Respect 70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WII", <http://www.pewglobal.org>, April 7, 2015.





## 追溯湮没的学术史 ——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的北宋 政治史研究<sup>1</sup>

孙 健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 摘要

20 世纪初，美国学者福开森围绕北宋中后期政治史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他的研究始于王安石变法，借助这一论题的巨大牵动力，又进而论及朋党之争、北宋灭亡等更宽泛、更开阔的命题，从而将讨论的主题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人物扩展到其背后的整个时代。福开森的研究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东西方学术交织的产物，一方面根植于西方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史学多有继承，从与中国传统史家截然不同的角度，揭示出王安石变法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开辟出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视野与新路径。它体现了东西方学界的交流与互鉴，既从中国学界获取灵感，也给中国学者以启迪。当前学界所认定的由梁启超开启、占据 20 世纪上半叶主流的对王安石变法价值的“再思考”，实际上便是由福开森的研究而触发的。福开森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对当前的学术史建构提出了挑战，促使人们思考在东西方学术交织的背景下重构近代宋史研究学术史的价值与意义。

### 关键词

福开森 北宋政治史 东西学术交流 20 世纪学术史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近代西文汉学期刊中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研究成果。

自 20 世纪末以来, 宋史学界对此前的研究成果展开了大规模的回顾与反思, 欧美学者的研究也自然成为学术史梳理的对象, 涌现出很多相关成果。<sup>1</sup> 然而不可否认, 当前宋史研究的学术史建构还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 目前对欧美宋史研究的回顾大多聚焦于 20 世纪后半期的成果, 对此前的研究情况, 特别是宋史研究在西方学界逐渐确立的早期历史, 则甚少论及; 其次, 现有的学术史梳理大多是将欧美学界和国内学界的成就割裂看待, 对双方的交往与互动则语焉不详。这样的学术史显然并不完整, 难以真实地展现学术发展的脉络。因此, 如何在东西方学术交织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近代宋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便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20 世纪初, 美国学者福开森 (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 围绕北宋中后期政治史展开了系

**对于今天的宋史学界而言, 福开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然而在晚清民国, 他却是人尽皆知的社会名流。**

统的研究, 迄今却已湮没无闻, 本文便拟追溯这段为人所遗忘的历史, 弥补学术史上缺失的一环。

### 一、福开森宋史研究的脉络

对于今天的宋史学界而言, 福开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然而在晚清民国, 他却是人尽皆知的社会名流。从 1886 年至 1943 年, 福开森在华生活了五十余年, 集教育家、报业大亨、政治顾问、慈善家、收藏家、艺术史家等头衔于一身。<sup>2</sup> 福开森在中国传统

文化研究方面显示出广泛的兴趣和广博的知识, 得到时人高度评价。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 (Robert Hans van Gulik) 对他极尽赞誉, 称赞他“谙熟于中国文化几乎所有方面”, “在汉学世界独自占据着属于他自己的一席之地”;<sup>3</sup> 美国中国学的奠基者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也赞许他“是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了不起的人物”。<sup>4</sup>

福开森本不以宋史研究见长, 然而自 1903 年至 1927 年的二十余年间, 他围绕北宋中后期政治史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研究单元。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严复先生曾言: “以余观之, 吾国史书之中, 其最宜为学者所深思审问, 必得其实而求其所以然者, 殆无如熙宁变法之一事。商君、王莽之所当, 其致力之难, 得效之不期,

1 国内学者方面, 包伟民教授对欧美学者的研究回应较多, 相关论文有《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 载《光明日报》2000 年 11 月 3 日;《“宋代经济革命论”反思》, 载《国际汉学》第七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2 年;《精英们“地方化”了吗? ——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 载《唐研究》第 11 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中国史研究: “国际化”还是“中国化”》, 载《历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国外学者相关论文有:【美】包弼德:《美国宋代研究的近况》, 载《新史学》第 6 卷第 3 期, 1995 年;【比】魏希德撰, 刘成国、李梅译:《美国宋史研究的新趋向: 地方宗教与政治文化》, 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 年第 3 期;魏希德撰, 高青译, 马小鹤校:《北美的宋代研究》, 载《北宋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年;【美】田浩:《北美宋代儒学和朱熹研究之演变: 60 年回顾》,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 9 月 22 日;【丹麦】Knud Lundbæk 撰, 耿昇译:《宋程理学在欧洲的传播》, 载《国际汉学》第 5 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0 年, 等等。

2 福开森, 1866 年出生于加拿大, 1886 年获美国波士顿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旋即携眷来华。直至 1943 年被日本遣返回美国, 他在华生活工作了五十余年。福开森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他参与创办了汇文书院和南洋公学, 分别是现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 年, 他买下《新闻报》, 使之成为当时在中国经营管理最好的一家报纸。福开森在中国艺术史和文物鉴定领域成就卓著, 是故宫博物院建院初期的功臣之一, 是故宫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一位外国委员。福开森一生著述颇丰, 组织编纂了《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历代著录画目》、《西清续鉴乙编》、《历代著录古金目》等中国艺术收藏史名著, 撰写了《中国艺术讲演录》、《中国绘画》等专著。福开森一生收藏了很多珍贵的中国艺术品, 晚年将毕生所藏尽数捐给他所创办的金陵大学, 其中包括王齐翰《勘书图》和青铜小克鼎等珍贵文物, 现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近年来, 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展开对福开森的研究, 出版了一些专著, 包括 Franklin D. Murphy & Thomas Lawton, *A Time of Transition: Two Collectors of Chinese Art*, Spencer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1; Lara Netting, *A Perpetual Fire: John C. Ferguson and His Quest For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R. H. van Gulik, “Dr. John C. Ferguson’s 75th Anniversary”, *Monumenta Serica*, Vol. 6, No. 1/2 (1941), p. 340.

4 费正清著, 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上海: 知识出版社, 1991 年, 第 60 页。

不如是之甚矣。”<sup>1</sup>或许正因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要性，福开森宋史研究的首篇文章便以此为主题。<sup>2</sup>在一篇文章有限的篇幅内，福开森论及变法的背景、思想基础、内容、失败原因、评价等诸多方面，但求全责备的结果便是对很多问题未能展开充分深入的论述，使得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面面俱到的泛泛而论。尽管如此，这篇文章在20世纪初的学术语境中仍独树一帜，文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迥然有别于当时普遍存在的针对王安石的否定态度。

南宋以降，中国传统史家逐渐形成一个主流看法，即把王安石变法和北宋灭亡联系起来，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才招致“靖康之祸”。这种论调的内在逻辑也指引着福开森的研究方向，继王安石之后，福开森开始关注北宋灭亡的问题。<sup>3</sup>福开森从内、外两方面总结了北宋灭亡的原因，外部原因当然是与辽、金的战争，内部则主要是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党争，以及北宋末期政治黑暗、腐败奢侈和皇帝软弱无能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福开森在文中提出了两个非常具



有超前性的观点。首先，对于宋朝在当时的“国际地位”，他认为在两宋三百余年间，后世称为“中国”的大部区域都处于外族控制下，历史上辽、金应被视为与宋对等的政权，宋朝从未取得像汉、明或清朝那样绝对至尊的地位，它只是几个并立的政权之一。其次，他初步形成了有关北宋中后期政治史的整体史观，提出哲、徽、钦三朝（1086—1126）<sup>4</sup>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此时北宋皇室的衰落达到顶峰，其结果导致北宋灭亡。“史识”的背后，必然要有扎实的“史学”基础作为支撑，这一整体史观的提出，表明福开森对宋代历史的把握有了实

质性进展，才能透过纷繁的历史表象，深入触及到深层次的历史脉络，最终提炼出长时段历史时期的同质性。

沿着上一篇文章提出的线索，福开森继而考察了宋徽宗时期的政局。<sup>5</sup>尽管福开森意在说明徽宗统治的黑暗腐败以及北宋灭亡的不可避免，但文章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却是他对其北宋中后期整体史观的修订：在哲、徽、钦三朝的基础上，他把神宗朝也纳入进来，主张将神宗以后的北宋四朝历史作为整体，以揭示北宋走向灭亡的原因；这段时期的政治主旋律是保守派与变法派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统治。<sup>6</sup>

1 严复：《严复集》第四册《〈王荆公诗〉评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50页。

2 福开森：《王安石》(Wang An-shih)，上海图书馆整理：《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会刊》(以下简称《会刊》)第35卷(1903—1904)，第19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03—613页。

3 福开森：《宋室南迁》(Southern Migration of the Sung Dynasty)，《会刊》第55卷(1924)，第28册，第34—47页。

4 福开森此处年代说明不准确，哲宗于1185年继位，钦宗1127年被掳，因此三朝起迄年代应为1085—1127年，或许福开森另有它意。

5 福开森：《宋徽宗(1082—1135)》(The Emperor Hui Tsung, A. D. 1082—1135)，《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2卷，1924年，第204—209页。

6 同上，第204页。



福开森对北宋中后期历史阶段的划分为考察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整体走向和特点设定了具体的历史语境，接下来有关朋党之争的讨论，<sup>1</sup>则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相关论述。福开森注意到朋党之争在不同时期性质上的变化，将之分为两个阶段：神、哲时期为第一阶段，徽宗时期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前期和后期性质又有不同：王安石在世期间，争论大体控制在政治讨论的层面，双方私人仇恨并不深；但在王安石、司马光为代表的一代人去世后，新一代继承者登上政治舞台，党争变得更加残酷，向挟私报复的方向发展。在第二阶段，“政客”蔡京攫取了权力，他与此前的官员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党争也被融入新动机，更多出于个人野心和利益。<sup>2</sup>他最后总结道，变法失败和北宋灭亡的原因有相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人才的缺乏。他进而提出，任何政治理论，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官员足够的支持，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这是北宋党争带来的教训。<sup>3</sup>

福开森的宋史研究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呈现出不断深入的内在理路。在他看来，王安石变法开启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进程，它引发的朋党之争成为北宋中后期政治史的主旋律。



借助王安石在学术研究中的巨大牵动力，福开森论及朋党之争、北宋中后期政治走向、北宋灭亡等更宽泛、更开阔的命题，从而将讨论的主题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人物扩展到其背后的整个时代。由此，福开森的研究便不再局限于对某一个人的赞颂，而是对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阐述。

## 二、东西方理论与知识的汇通：“西体中用”的架构

高罗佩为纪念福开森 75 岁生日撰文，称赞福开森“一方面向西方人讲授中国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向中国

学者展示如何将西方科学方法成功地应用于汉学研究”<sup>4</sup>。这一评论透露出，福开森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既扎根于西方学术传统，又有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借鉴和继承。

### （一）西方科学理论的介入

自修昔底德之后，西方史学中的政治军事史传统确立起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史学范型下，历史被归结为以政治、军事、外交、宗教等为代表的广义的政治史，而政治史又被简化为事件史和政治精英的思想发展史。重大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成为历史学者主要关注的对象，历

1 福开森：《北宋朋党》（*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会刊》第 58 卷（1927），第 29 册，第 332—352 页。

2 同上，第 344 页。

3 同上，第 350—352 页。

4 R. H. van Gulik, “Dr. John C. Ferguson’s 75th Anniversary”, *Monumenta Serica*, Vol. 6, No. 1/2 (1941), p. 340.



史学家就是要集中“叙述人特别是大人物是怎样思想、选择和行动的”。<sup>1</sup>

这种范式为兰克学派所继承和强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主宰着当时的历史研究。此时的美国史学还未完全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少学者前往欧洲，特别是欧洲史学中心德国学习，他们的史学思想、治史理论和方法也多受欧洲史学的影响。<sup>2</sup>福开森作为美国学术体系培养的学者，其研究中明显可以看到欧洲传统史学的影子。他所选择的议题是王安石和宋徽宗，是北宋党争和北宋灭亡，就宏观范式而言，这种研究秉承着西方史学的政治军事史传统，是政治精英历史传记和事件史的集合。

运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对宋代历史展开分析，秉持东西比较的视野，这是福开森宋史研究的一大特点。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史学兴起于20世纪初，但用比较史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却早已

### 高罗佩为纪念福开森 75 岁生日撰文，称赞福开森“一方面向西方人讲授中国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向中国学者展示如何将西方科学方法成功地应用于汉学研究”。

方都有一定的认识，通过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寻求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sup>3</sup>福开森或许对现代比较史学的理论并没有太多了解，但在研究中却自觉使用了大量比较史学的方法。他将“方田均税法”与18世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提出的赋税平等原则相比较，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sup>4</sup>他认为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与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持的立场相

同，二者都把促进百姓的物质繁荣视为最重要的问题。<sup>5</sup>

福开森用西方“自由主义政策”与“保守主义政策”的对立来概括王安石、司马光代表的新旧两党的政治理念。王安石认为政府应该考虑到现实需求，而不是一味遵循旧法。他的政策要求开发新税源，一切群体都应该纳税，这意味着平等地征用国家一切人力、财力和资源，用于国防和军事。<sup>6</sup>福开森认为，与此前的历史相比，新法措施是“革命性的”，展现出有关私有财产、百姓与国家关系，以及公共税收的全新理论。<sup>7</sup>因此，他用“自由主义”来形容王安石的政治信条。相比之下，“元祐党”则信奉传统的方法，他们要求继续“祖宗家法”，反对增税和募役，因此福开森称之为“保守派”<sup>8</sup>。

福开森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两个斗志昂扬的政党，相互之间

1 F. 菲雷，陆象淦译：《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与“全面的历史”》，载《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第2页。

2 除兰克史学外，当时的德国历史主义史学也是一种影响广泛的史学流派，史学研究中的政治倾向性，即在历史写作中强调国家、政权和权力等内容，也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一大传统。同样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历史主义史学逐步传播到欧美各地，使众多史学家深受影响（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0—195、243—244页）。

3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6—327页。

4 福开森：《王安石》（Wang An-shih），《会刊》第35卷（1903—1904），第19册，第610页。

5 同上，第606—607页。

赫胥黎的《天演论》于19世纪90年代经严复译出后，风靡了整个中国学界，王国维称该书“一新世人耳目”，从此“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静庵文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张广达先生认为，谈及清末中国人思想变化，赫胥黎的《天演论》在改变中国人以儒家为主的思维模式方面起了最大的作用（张广达：《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载氏著：《史学、史家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6页）。鉴于赫胥黎在当时中国学界的巨大影响，福开森将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与赫胥黎比附，显然能够促进中国学界接受其对王安石的看法，也足以启发中国学界从新的角度看待王安石变法这一传统论题。

6 福开森：《北宋朋党》（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会刊》第58卷（1927），第29册，338—339页。

7 福开森：《宋室南迁》（Southern Migration of the Sung Dynasty），《会刊》第55卷（1924），第28册，第39页。

8 福开森：《北宋朋党》（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会刊》第58卷（1927），第29册，第338—339页。

的激烈论战持续了十余年，这是意义重大的，比欧洲政党的兴起要早得多。福开森将北宋党争与同时代欧洲围绕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斗争进行了对比，二者同样都发生在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双方使用的策略也极为相似，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在中国，保守派取得胜利；而在欧洲，自由主义政策得以盛行。通过对此后东西方历史进程的比较，福开森展现出一种长远的历史眼光，他认为元祐党人的胜利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其后中国的稳定、统一和惯性都源于此。从那时起一直到民国，司马光看法控制了所有的历史解释，二程和朱熹控制了所有的哲学思想，所有后世的政治家都在遵循元祐党人的经济理论。人们只能想象，如果王安石的自由主义政策得以发展，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sup>1</sup>

福开森的研究在20世纪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借助于西方理论与东西方比较的视角，他从与中国传统史家截然不同的角度，揭示出王安石变法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开辟出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视野与新路径。他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宏观看法，以及由此出发对北宋党争长远影响的阐述，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有其价值与意义，

**除了使用西方理论作为分析性框架，不难发现，福开森对中国传统史学也多有借鉴和继承。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他对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的分析。**

能够给我们认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以极大启发。

(二) 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借鉴与承袭

除了使用西方理论作为分析性框架，不难发现，福开森对中国传统史学也多有借鉴和继承。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他对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的分析。福开森最初认为新法失败是由于它超前于时代，<sup>2</sup>但后来受苏辙观点的启发，他更倾向于认同元祐党人的看法，将变法失败归咎于变法派成员素质的低下。<sup>3</sup>福开森认为变法派成员大多无知而贪腐，正是他们使得变法声名狼藉，并最终导致北宋灭亡；相比之下，尽管不赞同元祐党对新法的批评，他仍认为元祐党人代表着北宋时期的学识、政治家风度、声望和尊严。<sup>4</sup>

福开森的看法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可谓由来已久，宋人批评王安石的一种主要观点便是他任用“小人”，最终为“小人”所误。熙宁九年(1076)，富弼上书攻新法云：“缘误用一二奸人，则展转援致，连茹而进，分布中外，大为朝廷之害，卒难救整。”<sup>5</sup>王岩叟更将新党成员逐个点评：“司农曰布，强悍而险刻；中丞曰绾，善柔而阴谗；曰向，剥下附上；曰起，很深；曰绛，苛佞；曰绛、曰琥，险回伎忌；曰定、曰秩，藏奸包匿；曰炯、曰确，狂诞轻狡；曰惇、曰将，阿谀辩巧；曰宦官昉，暴横凶忍，荼毒一方，威焰所向，人莫敢指；曰唯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党。”<sup>6</sup>

元祐党人对变法派的评价在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史家尊奉其说，视任用小人为变法失败乃至北宋灭亡的原因。如明人顾栋高言：“荆公本君子，因行新法而欲借小人以敌君子，其始为小人所朋附，继为小人所反噬，迨其没身复为小人所祖述，遂使宋室斲丧，而其身列于千古之罪人。用小人而卒为小人用，择术之不慎至于如此，吁，可畏哉！”<sup>7</sup>明末大儒王夫之同样认为，“苛政”虽病国虐民，但尚未足以亡国，而王安石任用宵小，“群

1 福开森：《北宋朋党》(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会刊》第58卷(1927)，第29册，第339—340页。

2 福开森：《王安石》(Wang An-shih)，《会刊》第35卷(1903—1904)，第19册，第612—613页。

3 福开森：《北宋朋党》(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会刊》第58卷(1927)，第29册，第350—352页。

4 同上，第341—344页。

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757页。

6 赵汝愚著，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点校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六《上神宗论王安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70页。

7 詹大和著，裴汝诚点校：《王安石年谱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6页。

小乃起而应之”，“于是泛滥波腾，以导谗宣淫蠱其君以毒天下，而善类一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怨，衅乃倏生，败亡沓至而不可御。”“其亡也，则惟通国之皆小人。通国之皆小人，通国之无君子，而亡必矣。”“然则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无人者，无大臣也。”<sup>1</sup>由此看来，福开森的看法显然源于对中国历代主流史家观点的承袭。

历史学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领域的开拓，有赖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而历史研究的纵深开掘，一般来说又以某种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运用为前提。<sup>2</sup>福开森的宋史研究扎根于西方学术传统，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为他提供了分析型的框架结构，以之应用于中国史学研究，得以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国传统史学多有承袭，从中丰富了知识积累。二者结合起来，使其研究展现出东西方学术交织的特质，形成了西学为骨、中学为肌的“西体中用”的架构。福开森的研究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所谓“西方汉学”，其实并不完全是一种“异域的想象”，其知识结构的形成与中国传统学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赖于在东西方交错的学术史中，探寻其发展脉络。

伯希和 (Paul Pelliot) 在谈到



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 (Emmanuel - douard Chavannes) 时说：“沙畹在高等师范学院获得哲学和史学的训练之后前往中国，是居留中国长达数年的第一位人士，因而身兼两种优势：既具有良好的高等学科训练，又对该国具有实际的知识。沙畹是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sup>3</sup>这一评价与高罗佩对福开森的赞誉异曲同工，揭示出沙畹和福开森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汉学研究模式转变过程中的类似作用。19 世纪末，欧洲历史学和人文学科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学、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开始相继浸润史学领域。与之相应，汉学研究的生态也正在发生类似的演变，在很多方

面有待于建立符合近代科学基本要求的轨范。<sup>4</sup>沙畹和福开森的学术意义，恰在于对这一学术使命的承担，将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引入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以西方的理论概念处理中国固有的材料，从而为汉学研究提供新的阐释学范式。

### 三、东西方学界的交流与互鉴：对比之下的一种推测

有学者曾提出“侨居地汉学”的概念，指代那些由侨居于中国或“第三国”，而非居于其所属国家“本土”的汉学家所完成的汉学研究。对于那些侨居于中国的汉学家而言，他们与中国学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之间

1 王夫之：《宋论》卷六《神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9—131页。

2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318页。

3 Paul Pelliot, “Les études chinoises”, Conférence prononcée à l’Ecole Libre des Hautes Etudes le 26 janvier 1945, *Renaissance, Revue trimestrielle publiée par l’Ecole Libre des Hautes Etudes de New York*, volume II et III, 1944—1945, New York, 1945, pp. 258—259.

4 李丹捷：《张广达谈沙畹及法国现代汉学的转型》，载《东方早报》2015年2月15日第002版；张广达：《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载《史学、史家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175页。



的学术交流也更为频繁。<sup>1</sup>福开森久居中国，他的研究是否对当时的中国学界有所启示，又是否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发展有所影响？要讨论福开森宋史研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与意义，这一问题不容回避。尽管囿于材料的限制，很难对上述问题予以明确回答，但仔细耙梳史料，仍可展开一定程度的讨论。

在当前的学术史梳理中，梁启超《王荆公》一书被看作20世纪初关于王安石及其变法最重要的研究，该书突破传统史学的束缚，尝试运用西方理论展开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一举扭转了自南宋以降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梁著的开创性意义自不待言，但很多学者在阐发其学术价值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其学术思想渊源的追问，而后一点恰恰应该是学术史研究应着力探究的对象。

梁启超在《王荆公》一书自序中写道：

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欲为作传也有年。牵于他业，未克就。顷修国史，至宋代，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而诤诸先史，则漏略芜杂，莫知其纪。重以入主出奴，谩辞溢恶，虚构事实，所在矛盾。于



是发愤取《临川全集》，再四探索，佐以宋人文集、笔记数十种，以与《宋史》诸志、诸传相参证。其数百年来哲人硕学之言论，足资徵信者，籀而读之，亦得十数家，钩稽甲乙，衡量是非。然后叹吾畴昔自谓能知荆公、能尊荆公者，无以异于酌潢潦之水而以为知海，覩甕牖之明而以为知天也；而流俗之诋謫荆公、污蔑荆公者，益无以异于斥鷃之笑鹏、蚍蜉之撼树也。<sup>2</sup>

这段文字表明，梁启超有关王安石的观点并非完全出自其自身的“发

明”，他在写作前曾广泛征集“数百年来哲人硕学之言论”，最后采纳了“十数家”之意见。这些资料显然不同于《临川文集》等原始资料，而是后人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议论、评定。正是经过对这些观点和看法的综合考量、借鉴吸纳，梁启超才最终形成自己的意见，因此这些“哲人硕学”的言论，便构成《王荆公》的思想来源。

《王荆公》出版于1908年，而福开森《王安石》一文发表于1903年，福开森文是否在梁启超“钩稽”“衡量”的“哲人硕学”之列？就一般意义而言，显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原因如下：其一，福开森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并与中国学界有着广泛而密切的交往，<sup>3</sup>他的研究必定会引起当时学界的普遍关注。其二，刊载《王安石》一文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在当时是重要的学术期刊，在中国学者中也有广泛的受众，<sup>4</sup>更进一步增加了该文的学术影响力。其三，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一篇以西方视角和理论切入、与中国传统史学观点迥异的“新作”，这与梁启超尝试以“新史学”的视角和方法、采用西方理论突破传统史学的旨趣恰好相符合，对于这样一篇扎根于西方学术传统，又与自己的研究主旨如此相近的重要文章，

1 王国强：《“侨居地汉学”与十九世纪末英国汉学之发展——以〈中国评论〉为中心的讨论》，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2页。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七册《王荆公》，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页。

3 福开森与当时的中国学界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曾与很多大学者相互通信交流学术观点，陈智超先生所编《陈垣往来书信集》中，便保留着福开森与陈垣先生的往来书信，讨论《畿辅通志》所载张留孙碑文（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441、442页）。

4 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89—97页。



如果说梁启超完全未加留意，显然很难解释得通。

福开森《王安石》一文提出了诸多在那个时代“标新立异”的论点。首先，该文率先提出新法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是目前所见较早明确提出这种看法的论述。其次，文章提出新法失败是由于它超前于时代。<sup>1</sup>第三，福开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改革计划表明，王安石是一个思想深刻、心怀天下的人。他的思想是功利主义的，但却始终心怀苦难的百姓。他的道德热情使他勇于面对政敌的批评，并且不断为百姓的福祉而奋斗。他从未使用过卑鄙的伎俩，也没有任何贪欲，对这一点人们没有一丝怀疑。他的失败是由于他过于乐观，认为百姓已经有所准备，会支持他们为他们的利益所做出的考虑。尽管他很注重实际，但仍寻求保存和发扬流传下来的古代圣贤之道。他为改革所创造的术语为此后的所有改革家所延用，甚至直到今天的改革派。<sup>2</sup>

福开森指出，王安石虽极力强调繁荣的基础在于增加国家财富，但他对人民强烈的同情心、对百姓福祉的关怀，都使得他的改革计划由于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而显得高贵。<sup>3</sup>

**福开森指出，王安石虽极力强调繁荣的基础在于增加国家财富，但他对人民强烈的同情心、对百姓福祉的关怀，都使得他的改革计划由于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而显得高贵。**

梁著在篇幅、内容方面均较福开森文丰富，但涉及到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一些基本观点，二者却极为相似。梁启超在书中写道：

荆公欲举财权悉集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诗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此义也，近数十年来乃大盛于欧美两洲，命之曰社会主义，其说以国家为大地主，为大资本家，为大企业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财，诚如公所谓“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者也。彼都学者，往往梦想之以为大同太平之极轨，而识者又以为兹事体大，非易数世后，未或能致也。夫以

欧美今日犹未能致者，而荆公乃欲于数百年前之中国致之，其何能淑。虽曰其造端非若彼之弘大，其条目非若彼之纤悉，其程度非若彼之极端，然其终不能全适于荆公之时与地，可断言矣。荆公之所蔽，惟在于是。若其学识之精卓，规模之宏远，宅心之慈仁，则真只千古而无两也。<sup>4</sup>（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这段内容凝聚了梁启超关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三个基本看法，其内在逻辑与福开森的论述如出一辙，这种高度一致性显然不能简单以“所见略同”来解释，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福开森文曾对梁启超有所启发。

梁著全文对福开森并无片言提及，这也给今天的学术史梳理造成障碍。然而综合考虑相关因素，梁启超对福开森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似乎也不难理解。首先，引用他人观点而不加以说明，对梁启超而言并非仅此一例。梁氏早期在报刊上所撰写之时论杂文，多有源自他人著作而不注明者。于政坛抽身后，他仍以办报的风格治学，往往凭日常读书的印象著述，常将他人成果与本人发明相混淆，又不标注，这在当时便已引起学风精细而极重发明权的日本学者的批评。<sup>5</sup>梁启超作《大乘起信论考证》，于日本学者之著述多有所本，虽在序言中有所

1 受苏辙看法的启发，福开森对变法失败原因的看法后来又又有变化，但这种变化在1927年发表的《北宋朋党》一文中才出现，已是在梁著出版多年以后。

2 福开森：《王安石》（Wang An-shih），第35卷（1903—1904），第19册，第612—613页。

3 同上，第613页。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七册《王荆公》，第65—66页。

5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8—250页。

说明，但在文中仍未一一标明出处。<sup>1</sup>有鉴于此，如果梁启超引用福开森之观点而不标注，便也无足为怪。

再进一步考察梁启超与福开森的关系，可以发现二人早已相识。梁启超在1905年写给其弟梁启勋的一封信中曾提及福开森：

《时报》一日千里最为快意，现每日总添数十份，现已实销至七千二百余份，在上海为第二把交椅矣（《新闻报》第一）。……而《新闻报》亦妒我。《新闻报》者福开森为东家，一则妒我之进步，二则因铁路档案恨我，故《时报》今亦在四面楚歌中，惟步步谨慎而已。<sup>2</sup>

二人相识这一事实不但让我们更加确信梁启超在写作《王荆公》前必定对福开森文有所耳闻，并且透露出，梁启超之所以在书中对福开森文未置一辞，或许与二人关系不睦不无关系。

梁氏《王荆公》一书在20世纪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原因就在于它开启了用西方理论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新视角。以往对此的学术史梳理偏向于从宏观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探究学术发展变化的深层动力。学者们指出，一方面，清末民初时节人们对于变法图强的渴求

### 福开森的研究在那个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东西方学术交织的产物，一方面根植于西方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史学有所借鉴和继承。

促成了对王安石变法价值的重新思考。“自海通以后，西学东渐，变法维新之说，日腾播于士大夫之口，安石之新法，亦遂为时论所推重，较之前此之称誉安石，如陆象山、颜习斋辈，殆又过。”<sup>3</sup>另一方面，当时西方近代学术的传入也为重新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提供了思想凭借。柯昌颐便曾指出，“安石励行新法，谤议盈朝，及其身后，而犹蒙诟逾千载，至今日得西洋政治思想为之印证，沉冤始稍表白。胡适尝曰：‘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自然不觉得王安石的奇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是故居今日而为安石白沉冤，诚亦环境有以支配之，使不得不然。”<sup>4</sup>

然而，学术的发展始终是宏观因

素与微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宏观社会文化背景自然是学术思潮赖以蕴生的土壤，而承担学术研究活动的学者在微观层面上的私人活动，也往往会对学术的发展产生同等重要的影响。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种种线索都表明，梁启超有关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观点之受到福开森的启发，应该是可以断言的。由此而论，以往所认定的由梁启超所开启、占据20世纪上半叶主流地位的对王安石变法价值的“再思考”，在潜在脉络上实际是由东西方学界的交流而触发生成的。这一“学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以来东西方学术团体之间的交往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也间接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学术史梳理的过程中，理应对此有足够的重视。

#### 四、结语

如上所述，20世纪初，当独立的宋史研究在东西方都还尚未正式确立时，一位本不以宋史为专业的学者，围绕着北宋中后期政治史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研究单元。福开森的研究在那个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东西方学术交织的产物，一方面根植于西方学术传统，另一方

1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2 中华书局编辑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上册《梁启超信札·致梁启勋书（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页。

3 熊公哲：《王安石政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

4 张广达先生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的转型多有论述，他指出，在此一时期，时代导致中国学术发生巨大变化，由于自身的演变和西学的强势介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不可能依旧保持原貌。面对西方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挑战，知识界亟于借用西方观念和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实现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这在当时已成为学界共同的追求（张广达：《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载《史学、史家与现代学术》，第1—41页，第41—56页）。熊公哲：《王安石政略》，第1页。

面又对中国传统史学有所借鉴和继承。它为后代学者树立了一个榜样，从西方理论和视角出发，很多中国传统史学中隐而不彰的内容得以显现，形成了当时的“新知”，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借以反观自身的“他山之石”。

福开森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对当前的宋史研究学术史建构提出了挑战，暴露出当前学术史梳理中存在的不足。首先，当前的学术史建构，对于国内宋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已经有比较清楚的把握，然而对于西方学者的研究，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西方学界的研究状况，仍然知之甚少。在学术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这样的学术史显然是不完整的。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福开森的研究当然有其不足，但同时也应看到，他在 20 世纪初所提出的一些论断，在当今学界仍然不断得到学者的呼应，仍然足以启发学者新的思考。<sup>1</sup> 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利用此前的研究，特别是来自异域的“他山之石”，为今后的研究提借镜鉴，是今后学术史建构应着重强调的方面。

其次，福开森的研究实现了东



西方学界的交流与互鉴，一方面从中国学界获取灵感，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学者以启迪，这也提醒我们近代中国学术形成的复杂性。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是在与世界的交流中建立起来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的面貌，伯希和 (Paul Pelliot) 于敦煌学有开创之功，没有高本汉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李方桂和赵元任的语言学也不会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欲知 21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大道何在，应对近代学术史的利弊得失详察深究，而与国际汉学

界的交往，为其中重要内容。如果说不通域外不能知近代史，那么不知中外学术交往，则难以恰当体验近代学术发展。”<sup>2</sup> 当前的宋史研究学术史梳理，基本是将国内、国外的研究割裂开来，各自作为封闭的领域看待，而对中外学界之间的交往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发展方向的变化则语焉不详，这显然不利于对近代宋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如何在东西方交错的学术史中，重新建构近代宋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脉络，是当前宋史研究学术史梳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 2006 年，美国学者伊霏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与 Maggie Bickford 主编的《徽宗与北宋后期：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该书系由十三位学者所撰论文组成的论文集，集中体现了西方学界对于宋徽宗及其时代的最新认识。与多数国内学者注重神、哲、徽三朝政治的割裂性形成鲜明对比，该书的作者尤其强调从宋神宗到宋徽宗三朝连续性。如 Ari Daniel Levine 讨论北宋后期党争两派的政治用语，强调神、哲、徽三朝连续性，认为三十年间政治斗争内容变化不少，而政治斗争用语却极具同质性，从而使这父子三代的朝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 (参见包伟民：《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第 115—120 页)。当代学者的研究当然较福开森的研究更为精细、深入，他们或许也并不知道福开森早在 20 世纪初便已提出应该将北宋后四朝视为一个整体的看法，但在内在的学术脉络上，仍可将这些研究视为是对福开森认识路径与分析框架的继承、推进和完善。除此以外，福开森关于宋代“国际地位”的看法、关于党争性质的变化等一些观点，都在当今学界得到学者们各种形式的呼应，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撰文说明，此不具论。

2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 2 页。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mailto: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6556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